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

清初至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利率史初探

——基于中国利率史数据库（1660—2000）的考察

陈志武　彭凯翔　袁为鹏

［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利率史课题组的数据库建设工作，就数据库的资料采集、整理方案等作简要说明。对数据库的统计分析表明，资料选取不同、借贷交易的背景和形态不同，其所对应的利率都有所不同，统计特征上呈现出较大差别，这既表明了现有文献对中国利率史的种种认识误区之来源，也证明了系统的数据库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利率史数据库的统计分析，本文还初步探讨了清初至二十世纪前期各类型利率的空间分布、长期趋势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利率史　数据库　高利贷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6）－04－0036－17

一、引言

长期以来，学界在讨论近现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农村社会面貌及农民生活状况时，往往强调农村高利贷对广大农民生产与生活的不利影响；①在讨论近现代中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经营、技术改进等与发展相关的问题时，又会强调国内生产者面临较高的利率，长期资本投入不足。②在讨论近代早期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之类问题时，高利贷所引起的资本积累困难也是常见的假说③。这些论点之间本身就隐含着矛盾，但也看到，利率的水平及其变化是理解中国长期发展的关键变量之一——即便是在仅将高利贷与传统社会剥削形态相联系的论述里，利率也是理解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收稿日期］2016－05－20
［作者简介］陈志武（1962—），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美国康州，06520，zhiwu. chen@ yale. edu；彭凯翔（1978—），男，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开封 475004，kaixiangp@ qq. com；袁为鹏（197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836，bjyuanwp@ 163. com

①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问题》，《清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王世庆：《十九世纪中叶台湾北部农村金融之研究》，王世庆：《清代台湾社会经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年；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年等。

② 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东大图书公司，1997 年；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③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 年。

虽然利率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是如此重要，但到目前为止还缺乏一个公认的、包括各种现存档案、文献的利率历史数据库。在缺乏这样的系统性借贷历史数据库的情况下，相关学术研究就难以展开，或者只能基于个案或少量局部案例做研究，那样不仅容易重复研究，而且也难以避免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从 2004 年开始，我们课题组努力尝试建立尽可能完整的清初以来中国利率史数据库。

利率数据有其复杂性，因为借贷类型不同、借贷对象不同、借贷期限差异等等，对应的利率都应该有别，难以直接比较。所以，仅仅通过少数个案，难以判断利率的真实普遍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现有文献中虽然已有一些较系统的利率数据——如 19 世纪晚期以降的上海银拆数据、清代典当利率等，但它们在时期、地域上或有局限，对应的金融产品或属不同类型，直接进行比较都有很大的困难，而且这些数据也没有统一整合在一起。此外，资本配置的效率不仅受利率绝对水平的影响，更受资本市场的制度机制与效率的影响，包括交易成本、契约执行风险乃至交易中的人身安全等因素的影响。① 后者固然在利率绝对水平的高低中有所反映，但更反映在各地区间、各金融部门间的利率整合程度上，围绕金融交易的方方面面制度建设都会影响到利率与市场整合效率。如果我们想研究利率的整合，就更需要跨地区、跨部门的系统数据。

此外，在以利率来解释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发展路径上的差异时，通常是以欧美等国为参照的，但是各国的利率资料形态各异，对应的金融产品也有别，进行匹配的比较并不容易。例如，中国的徽州、福建等地的民间文书中存在大量借契，提供了民间借贷利率的系统样本。近代早期的欧洲尽管也广泛存在商业借贷以外的各种民间借贷形式②，但是，受高利贷管制等因素的影响，却难以找到与中国类似的大宗资料来考察它们的利率。③与此相反的是，欧洲的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城市 16 世纪以后就有银行间拆借行市的系统数据，但中国类似的数据目前只有 19 世纪以后的，而且地域也局限于上海等少数商埠。显然，直接以中国较丰富的民间借贷数据与西欧较丰富的拆借行市相比并不合适，只有全面地梳理数据，进行整理、衔接等工作，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两类经济中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包括各种类型借贷交易的利率数据库，以此为基础来系统地研究 17 世纪以后中国金融与社会的变迁，也为学界提供一个尽可能系统的、可以共享的利率史数据库。下面首先从资料选取、样本分布等角度对已经收集的利率数据概况进行介绍，然后再根据数据库对清代利率的水平及其变化等进行初步考察。

二、利率数据库介绍

1、资料选取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尽可能全面的利率数据库，所以各种类型的资料都在搜集范围

① 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经济研究》2014 年第 9 期。他们通过对清代借贷命案的研究发现，在利率不为零的情况下，借贷命案中被打死的一方为贷方的几率在 60% 左右，说明贷方的人身风险相对较高，因此贷方会要求额外的风险溢价，最终使借贷利率更高。

② 参见 Fontaine，*The Moral Economy*：*Poverty*，*Credit and Trust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③ 关于这一比较的困难，参见 Rosenthal and Wong，*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 Homer and Sylla 所著 *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New Brunswick，N. 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6）这一利率史的经典著作里，欧美国家的拆借等行市数据非常系统，民间借贷数据却只有零星的一些个案，中国部分因为现成的行市数据不多，内容因此显得颇为单薄。

内。现分类说明如下[①]：

1）民间文书、司法诉讼档案、商业信稿、银行档案、笔记、日记等一手史料。徽州、闽台、浙江石仓等地均存有大量清至民国间的契约文书，其中借贷契约甚多，相应的出版物亦已蔚为大观。[②] 我们目前利用的契约主要即来自这些出版物。账簿等其他民间文书中也能发掘出一些利率史料，比较大宗的如19世纪前期为主的统泰升账簿[③]。但账簿较少公开出版，数据库中所用主要为课题组从北京等地档案馆、图书馆收藏的账簿中直接采集的。民间文书的一个局限是地域分布上太过集中于某些点，为此，课题组采集的另一个重要对象是司法档案，尤其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中关于债务的部分，它也包含了丰富的利率资料，并在时空的分布上更为平衡（就18世纪前期至19世纪末期而言）。此外，上海等地现存的银行档案非常丰富（尤以20世纪前期为主），对于研究金融市场极为重要，涉及利率的资料也不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利率：一是各行具体业务中采用的利率，二是各行通讯调查的各埠利率概况。

2）晚清至民国报纸期刊，尤其是大量的民国金融、经济期刊。它们提供的利率资料一方面来自对市场行情的采集，这相当于一手的材料；另一方面是刊载的调查报告，经过了报告人的处理，是二手的材料。其中，《银行周报》、《经济统计》（银行周报社）、《钱业月报》、《中外经济周刊》、《工商半月刊》、《统计月报》等都有专栏随时报告金融市况，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的专刊以及汉口、北平等市的银行业专刊也都从各自渠道提供了丰富的信息。[④] 尤其是《银行周报》、《经济统计》、《中央银行旬报》与《中央银行月报》，提供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不少都市、商埠的利率行市数据。

3）资料集。民国各种调查资料提供了丰富的农村金融史料（包括利率），尤其是在1930年代前后，晋鲁苏浙湘陕等省实业志，行政院江浙等省农村调查，中央农业实验所之农情报告，金陵大学农学院、各国营铁路以及满铁等机构的调查等都层出不穷。[⑤] 与此同时，民国统计年鉴、统计提要，各省统计年鉴或工商统计等，也提供了当时某些县市、商埠的金融统计。[⑥] 建国后的金融资料集中，利率数据最系统的当推《上海钱庄史料》[⑦]，提供了1872—1952年间上海日拆的系列数据。《南开经济指数汇编》也汇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多种金融市场数据，惟其中的上海日拆数据不如前者细致。[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科院编制的各种近代经济资料集亦编辑了不少涉及金融的史料，但以农村高利贷为主。[⑨] 各大银行的史料集则为了解20世纪上半期为主

---

① 数据库中对每条数据的来源都有详细注明。由于所涉资料繁多，兹仅大致说明我们数据采集的范围及方式，这与后文所述的数据类型亦有密切关联。

② 参见王钰欣、周绍泉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刘伯山编：《徽州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世庆：《清代台湾社会经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杨国桢等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增刊等等。

③ 袁为鹏、马德斌：《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 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④ 参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52—653页的综述部分。

⑤ 1930年代的调查资料汇编参见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1933年；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黎明书局，1935年；萧铮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成文出版社，1977年。

⑥ 金融统计比较丰富的如《河北省工商统计》，河北省实业厅，1931年。

⑦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⑧ 孔敏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⑨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中华书局，1962年；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

的城市工商业借贷提供了较多资料。[1] 此外，各省文史资料及地方史志均有关于金融的史料，如张步先就由此整理出清末民初为主的46个城镇典当业利率[2]。

4）论著。民国时期的金融专著为了解当时的金融提供了翔实资料，如杨荫溥《中国金融论》对民国金融市场的制度和沪汉津等埠的金融市场状况都有详细介绍，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利用大量的调查资料来说明各省农村的金融发展和借贷情形，银行周报社《上海金融市场论》对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行和行情都有叙述，宓公干《典当论》则专论典当一业，从历史到各省、再到各国都有述及。[3] 近数十年来，亦出现了不少对金融史的专题研究，典型的有黄冕堂利用清代内阁所藏刑科题本对农村高利贷的分析，刘秋根之论典当史、明清高利贷史，李金铮之近代农村金融研究，黄鉴晖等山西学者之票号研究，洪葭管、张继凤对上海金融市场的研究等等。[4] 这些专著均有金融市场的视角，亦对利率做了梳理。

2、数据类型和内容

根据前述资料，数据库的样本量目前达19879条，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借贷个案的利率。这类数据中的每一条原则上对应一笔借贷交易[5]，主要从借贷契约、刑科题本、账簿、日记等记录有原始交易信息的材料中采集，共6015条。二，利率行市或标准利率。如清代中后期票号的银标行市，近代上海、汉口等地钱业拆借市场上的银拆行市，典当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众公开的放款或存款利率标准。这些利率不对应于每笔具体交易，而是反映了一定时空下某类交易的普遍情形，共计5658条。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上海等地的银拆行市存在采样频率较高的日度或月度数据系列，而其他数据的变化和采样频率均较低，此处将高频的银拆行市转化成了年度的数据以相互比较，所以，每条银拆数据代表的是该年的平均行情。三，计划性的而未必反映市场实际情形的利率，共493条。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94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制定的利率牌价，此外如官方救济性放贷的利率也在此类。四，调查报告、笔记、回忆录（含口述访谈）、后人论著等文献中对利率的某种概述或统计描述，共7713条。前三类数据都可视为未经加工的原始数据，第四类数据则反映了调查者、撰述者等基于信息所作的某种判断。当然，此处所采用的概述性资料主要也来自以原始数据为基础的调查统计，只是我们无法获取其原始数据，对其数据处理过程亦不明确，所以归入此类。例如，1930年代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组织了跨22省、871县的农情调查，在报告中包括了借贷等方面的分省统计描述，但是每个基层单位的数据现在已难以获取，而且基层数据本身也不是基于实际交易统计产生的，所呈现的毋宁说是报告人本身的认知与判断。[6]

表1报告了这四类数据在不同时期的分布。1840年以前的数据绝大多数为来自契约文书、

---

① 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等。

② 参见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3—69页。

③ 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上海书店，1991年；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上海银行周报社：《上海金融市场论》，上海银行周报社，1923年；宓公干：《典当论》，上海书店，1992年。

④ 参见黄冕堂：《清史治要》，齐鲁书社，1990年，第465—494页；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李金铮：《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人民出版社，2004年；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⑤ 有个别是若干笔交易的平均，在数据库的代码中会说明所涉笔数，在后文将要介绍的"附表"中则尽可能将逐笔交易的原始信息列出。

⑥ 参见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民国二十三年农情报告汇编》，南京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6年。

刑科题本的个案数据，1840 年以后随着口岸城市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新式金融的兴起，行市类数据大为增加。同时，20 世纪上半叶问卷调查之风兴起，来自调查报告的概述性数据一度居于主要地位。

表 1　各类型样本的分布

	1840 以前	1840—1911	1911—1936	1937—1949	1950 以后	合计
个案	4 458	682	650	183	42	6 015
行市	70	317	2 786	876	1 609	5 658
政策	11	19	185	240	38	493
概述	118	385	6 211	724	275	7 713
合计	4 657	1 403	9 832	2 023	1 964	19 879

在这些类型的数据中，行市数据一般对应标准类型的交易，易于构建可比的序列，但对于大量的个案资料中的利率，每条资料对应的交易都有其特定的约定事项，是难以直接进行比较的，要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直接比较则更为困难。为此，数据库不仅收集利率数据，也尽可能地对每条利率数据所对应之借贷交易的各种属性予以标准化处理，从而有可能在控制各种特定属性的条件下分析利率高低及其变化的成因。数据库中予以标准化的属性主要有：利率（统一转换为年利，单位为%）、每条利率发生或适用的时期（由起止年月界定）、地区（精确到县）、城乡类别、放贷方身份或机构类型、借入方身份或机构类型、借款额、标的形态（实物或具体货币类型）、借贷期限、信用方式、借贷类型（普通借贷、长存等）。同时，考虑到不同类型的数据表达方式不同，误差的程度与方向也不同，为了使这些模糊的方面得到反映，数据属性中还包括取值方式（将“不超过”、“不高于”等表述对应的数据归为高值类型）、数据类型两个指标。研究者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设计处理数据误差的方法。

为了使标准化的处理过程更加透明，数据库分为“统表”与“子表”两部分。统表为上述标准化的数据，子表则保留资料的原始表达，两者是一一对应的。对于资料来源、备注等未标准化的信息，亦在子表中呈现。考虑到借贷交易类型不同，所涉及的属性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将“子表”分为“典当”、“私人借贷”、“农产借贷”、“机构借贷”四类，在“典当”中增设“当物”、“当价”等项，“农产借贷”中增设“借物”、“偿物”等项，“机构借贷”则另有“业务类别”一项。此外，对于银拆等相对高频的数据，在“统表”与“子表”中均转化成了年度数据，对于一些大型调查的统计数据，则有很多有意义的项目不便直接纳入数据库中，但它们对于各种专题的研究又是非常宝贵的，为此又另外编有“附表”，将更完整的资料纳入其中，并在“子表”中注明相关数据所对应的“附表”。

3、数据分布

目前的 19879 条数据最早为 1563 年，最晚为 2005 年，空间上涵盖西藏外的所有地区（按当代行政区划）。① 不过，如图 1 所示，实际数据的分布并不均匀。就所有时期合计而言，东中部地区以及长江流域的数据相对较多，西北、西南等地区的数据目前仍较稀少。具体到不同时期，则 1840 年以前的数据集中于存世文书或基层司法档案相对系统的徽州、福建、巴县等地，尤其是徽州的数据占比较多——尽管基于刑科题本的借贷数据分布是更加均匀的。相较之下，1912—1936 年间的数据分布更为平均，除了少数边远省份，大多数地区均有百条以上的样本，而在 1840 年以前的一二百年里，大多数省仅有数十条记录。这对内陆地区主要归功于调查数据的增加，对口岸地区则是因为行市数据的增多。辽宁在这一时期两类数据均较丰富，所以样本量一时

① 为便于跨期比较，省份的归属以当代行政区划为标准，但考虑到历史延续性和经济地理上的相似性，重庆的数据仍归入四川。

超过其他各省不少。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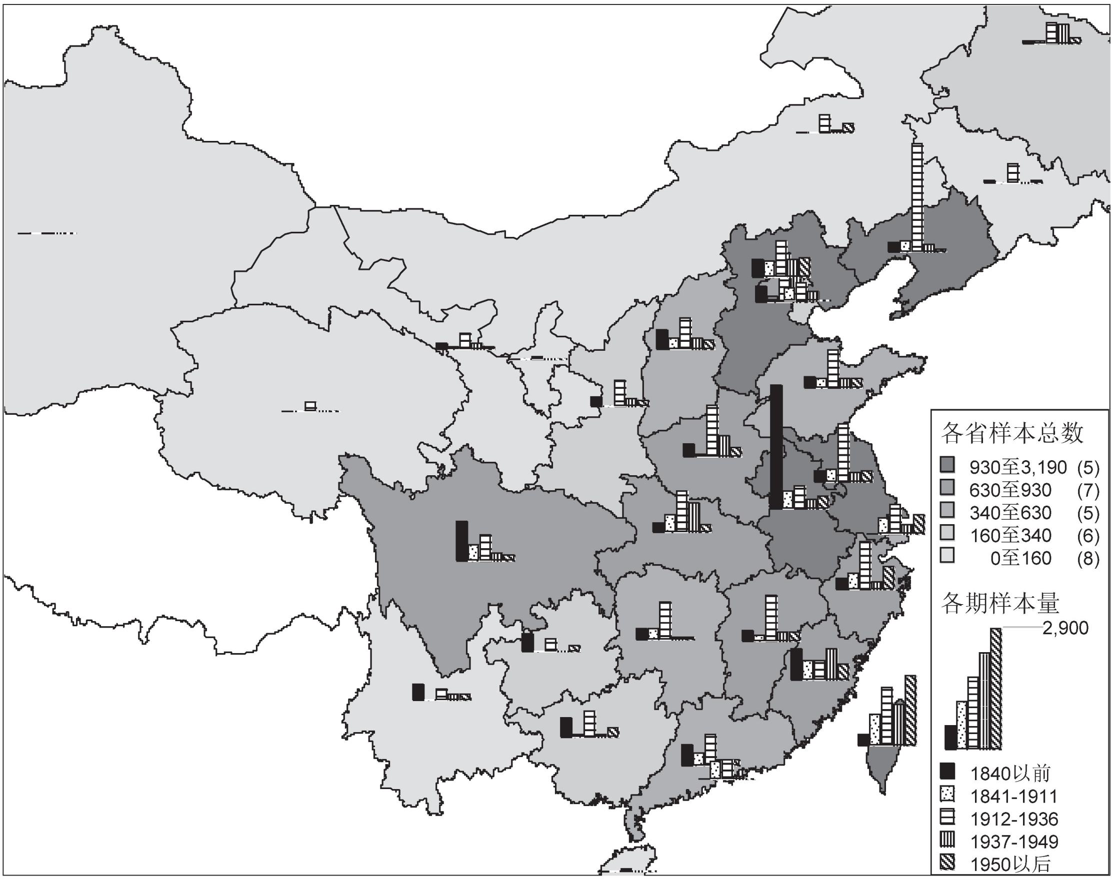

图 1　数据的时空分布

说明：1）行政区划主要按当代，见上页注①说明。2）为便于观察数据较少的地区间之差异，对各期样本量采用平方根刻度。

数据的分布特征意味着要分别构造所有地区的长期序列数据是比较困难的，但对于徽州、福建等若干地区，是可以尝试进行长期的动态研究的。特别是根据借贷契约进行专题的研究，以探讨制度、行为层面的微观问题，则这些区域的数据更是弥足珍贵——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其难得的样本。② 同时，对于 20 世纪前期，由于数据分布较为均匀，而且数据多为代表性较强的调查统计或行市数据，因此颇能反映当时各地的利率差异，适合于截面的分析。至于 1841—1911 年间的样本量看似不大，但包含了不少重要商埠的行市数据，这类数据的代表性强于其他数据，并且跨期的可比性也较强，前后相衔即有可能得到百多年的序列数据。

以往关于传统利率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村“高利贷”，但从金融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以及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考虑，则城市或商埠的行市具有更重要意义。为此，课题组在数据收集上对此特为注重。从表 2 的城乡分布统计可见，虽然农村借贷的数据量仍为最多，但城市或商埠的样本占

① 其中，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辑录了各县银行等金融机构及私人放款的利率（《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报告书》，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1931 年），伪满洲国实业部则调查了各县农村借贷的情形（《農村実態調査報告書》，第 15 卷，“農家の負債並に貸借関係篇（南満の部）”，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産業調査局 1937 年刊，東京：龍溪書舍，1989 年）。这些数据中，银行等机构放款利率应该来自于其行市，私人借贷利率则需经调查整理而得。

② 参见彭凯翔、陈志武、袁为鹏：《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究》，《经济研究》2008 年第 5 期。

比亦不小，为构建序列数据提供了一定基础。总之，尽管现有资料不足以提供现成的、覆盖整个时空的面板（panel）数据，但形成数据库后，可供研究之处仍是不少。后文即将根据现有数据的分布情形，对前述各方面略加尝试，以便读者理解数据库的研究价值。

表 2　数据城乡分布表

	1840 以前	1840—1911	1911—1936	1937—1949	1950 以后	合计
农村	3 162	403	4 250	758	416	8 989
城市/商埠	171	626	2 652	785	1 417	5 651
普通县镇	272	374	2 923	480	131	4 180
不详	1 052	0	7	0	0	1 059
合计	4 657	1 403	9 832	2 023	1 964	19 879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新的史料（尤其是民间文书）正不断被发掘出来，利率史数据库仍将随时进行升级和完善。例如，近年浙江发现的石仓文书非常系统，里面有不少与借贷有关的契约、账簿等资料①。山西也不断有契约、账簿等文书浮现，只是进入学界视野、得到系统整理和研究的尚较少②。另外，课题组目前对刑科题本除了根据标题检索外主要采取抽样整理的方式，将来会扩大采样范围，亦能增加不少样本。至于样本中占比较大的徽州文书，数据库目前主要据公开出版的资料集收录③，各收藏单位未出版的文书为数仍巨，有待进一步收集。这些工作的耗时虽然难以预计，可一旦完成都将有助于改进数据分布上的不平衡问题，本文的介绍因此仍是阶段性的。

三、基于数据库的统计描述

1、各类型利率的统计特征

流行观点多将中国传统民间借贷简单斥为“高利贷”，但具体情形则远为复杂。通过数据库，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解读的偏差之所在及其产生之原由。为此，表 3 对现有历史利率数据作了资料类型和时期的描述统计。从总体上看，清代直至当代以前利率的均值及中位数均在二三分之谱，未超过清代法律规定的月利三分（相当于年利 36%）。所以，简单地归之于“高利贷”，显然过于刻板。在各类型的利率中，又以概述性资料中的利率偏高，在 1840 年以前，这类资料率多批判性描述，均值因此超过五分，而在 1930 年代，这类数据虽然多出自调查统计，但在调查中更容易注意当时的“农村破产”等问题，样本的选择性亦难以避免。倘若深入观察更原始的个案资料，则会发现利率的均值或中位数大致低于月利三分，而更接近许多地方的二分惯例（在南京政府期间复成为界定高利贷的法定标准），惟于 1950 年代因高压禁止民间借贷，官方报告的利率虽低，但民间却出现了种种变相的“高利贷”，因此个案利率较高。两相对比，不难发现：以往研究中“高利贷”印象的形成，实与史料运用上偏向概述资料有关，一旦运用统计手段对大量的原始材料进行系统分析，其偏差就立即呈现出来了。

如果进一步观察行市或机构的利率，其通常又比个案更低。主要的原因是：在 1840 年以前，

---

① 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主编：《石仓契约》（第 1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

② 有关刘秋根教授搜集整理和利用这些账簿所进行的初步研究工作，可参看：王丽彦：《清末民国借贷研究——以 10 份账本为基础》（指导教师：刘秋根），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5 月。最新的进展可参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网站《山西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2015 年）课题组第四次简报，网址：http：//www. npopss—cn. gov. cn/n1/2016/0616/c393013－28450708. html，发布日期：2016－06－16，访问时间：2016－07－15。

③ 有的在整理时未出版，但目前已出版。如黄山学院所藏借贷契约，有一部分现已整理出版，参见吴秉坤：《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资料汇编及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

这类资料最多者为典当业的公开利率，而在此后，来自票号、钱庄的记录逐渐增多，19 世纪末开始更增加了不少银行的资料。因此，1840 年以后利率通常在二分以下，中位数更降至一分左右。这些机构所从事的是比较专业的商业化放贷，通过规模效应更强、信用控制更完善的金融中介服务，对当时的市场运行、经济组织等均起重要作用，以往关于传统“高利贷”的讨论往往忽略了这一部分，直接以私人间非商业借贷的利率来讨论经济发展受到的阻碍，可以说存在严重的误读。

表 3　利率的描述统计（按资料类型和时期分组）

		时期					
		1840 以前	1840 - 1911	1911—1936	1937—1949	1950 以后	合计
资料类型	行市	39.20 [30.00] (27.65)	18.96 [9.40] (33.49)	23.86 [13.20] (42.44)	12.84 [6.16] (19.20)	15.76 [10.80] (14.27)	21.18 [12.00] (35.79)
	个案	26.98 [20.00] (36.01)	21.35 [19.79] (17.55)	26.62 [14.20] (40.62)	21.72 [10.80] (25.87)	59.67 [36.00] (57.29)	26.20 [20.00] (34.88)
	政策	21.78 [24.00] (9.46)	22.79 [22.00] (15.42)	9.99 [9.00] (7.55)	12.22 [11.70] (4.52)	4.00 [4.00] (缺值)	11.76 [9.60] (9.22)
	概述	51.24 [36.00] (59.93)	24.28 [14.18] (34.19)	37.29 [25.00] (46.81)	41.23 [30.00] (35.68)	15.13 [14.55] (7.14)	36.48 [25.00] (45.52)
	合计	27.76 [20.00] (36.97)	21.63 [15.36] (27.28)	32.25 [20.00] (45.29)	33.89 [30.00] (34.03)	15.76 [11.16] (13.85)	29.01 [20.00] (40.26)

说明：1）利率均转换为年利，单位为%。2）每组所列统计指标依次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中位数和标准差分别以[ ]、( ) 括示。

考虑到不同放贷主体的利率所差甚远，图 2 以盒状图绘示了各主体对应的利率分布。为了排除恶性通货膨胀、制度变革等带来的影响，图中样本期截止 1937 年；又为了绘示的方便，将个别超过年利 500% 的畸高利率亦剔除在外。如图所示，私人借贷利率中一半样本（由盒状阴影表示）大致在年利 20 ~ 36% 之间，与清代民间社会二三分的习惯相吻合。典当业、高利贷者（如以“印子钱”等名目专事放贷者）的放贷多针对信贷受限的底层民众，利率分布偏高，而熟人之间形成的合会、社团（如宗族、神明会）等组织的放贷利率分布偏低。同时，商业化借贷的利率也是相对偏低的。商铺放贷利率仅比私人稍低，但金融机构中，无论是新式的银行、合作社，还是传统的票号、钱庄，其经营中的利率均低于社会习惯利率不少，进一步印证了前文对二者关系的讨论，亦说明正规金融发展（哪怕是简单的钱庄票号）对降低借贷成本是非常有益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机构的利率分布非常收敛（分布范围窄），私人借贷的利率则发散得多，更有许多超出正常分布范围的样本（可由括线外的短划线表示），这与 Stiglitz and Weiss 的经典理论相一致。①即，金融机构面临着较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无法甄别不同的个体以采取不同的利率，所以，其利率将偏低，分布亦将更加规整。与此对应的是，在均衡利率下会出现信贷配给现象，并非所有借贷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事实上，金融机构为了削弱信息不对称问题，通常不直接对平民放贷，而主要与同业或殷实商户、绅宦等往来，这会进一步加强其利率的收敛，当然也意味着平民将面临更严重的信贷配给或信贷获取约束，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票号。票号经营的是跨地区的金融网络，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不如与各地本土钱庄的联系密切，放贷自然相对谨

① Stiglitz, Joseph E., and Andrew Weiss, 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3: 393—410.

慎，多限于当地钱庄等可靠的机构以及有人事往来的绅宦，而不是对任意的大众或商户放贷，其利率的分布故而最为收敛。由此带来的是借贷市场的某种分层，不同主体所处的市场间既相互渗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例如，中小商户难以从票号直接获得资金，但钱庄可以将票号拆入的资金转贷给中小商户，而中小商户获得的资金又可为平民提供借贷。可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及信贷配给，平民无法跨越商户、钱庄直接向票号借贷，不同市场间的利率因此不完全受“一价法则”的支配，呈现出的特征也很不一样。文献中以中国的私人借贷利率与西欧的机构同业借贷利率相比的常见做法，因此是不太得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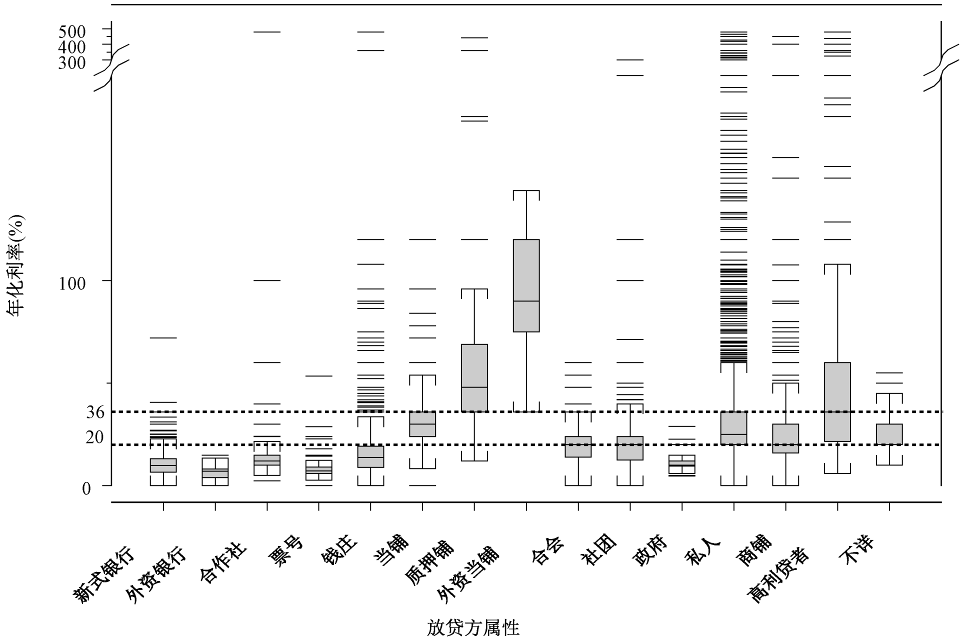

图 2　按贷方分组的利率分布（1937 以前，〈 =500%）

说明：1）盒状图中带阴影的条框代表中间 50% 的样本（条框中的划线为中位数），再以线段括住按条框长度上下各延伸 1.5 倍内的样本，括线以外的划线则代表分布末梢的异常高或低值。2）“外资当铺”是 20 世纪初华北和东北某些城市中的日资当铺。3）为使图形更加直观，将纵轴在［200，300］处隔断，并对［300，500］部分进行压缩。

2、利率的时空分布

利率除了存在类型上的差异外，还存在空间及时间上的差异。由图 1 可知，1911—1936 年间的样本在空间上的分布相对平衡一些，对于考察利率的空间差异较为合适。因此图 3 将利率分为民间日常借贷和商业借贷两类，绘示了其省际分布。其中，民间日常借贷指在商埠以外的县镇、农村地区里私人①之间所进行的货币借贷。②考虑到资料来源有个案、调查等比较复杂，而且个案中异常点较多，所以对各省取中位数以求稳健。商业借贷则取借入方为商户或传统金融机构的样本，其数据类型主要为个案和行市，后者代表性较强，前者亦不如私人借贷那样受异常点影响，所以直接对各省取平均值。如图 3（1）所示，各省的利率水平有较大差异：商业借贷利率低者不及 1 分，高者近 3 分；民间日常借贷利率较此为高，低者不及 2 分，高者则达 6 分左右。总体上，二者在省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尤其是对民间借贷利率较低（如，4 分以内）的部分；至于利率较高部分，民间借贷的利率较为发散。也就是说，商业借贷市场和民间日常借贷市场是

---

① 数据库里的私人主要指普通平民，是相对于商人、地主、官僚、社团等有特殊属性的个人及非个人的组织而言的。

② 之所以取货币借贷，是因为春借秋偿等实物借贷的利率，隐含了季节差等因素，直接放在一起会有可比性问题。

基本相通的，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一体化：民间日常借贷利率低的省份，其商业借贷利率也会趋低；反之亦然。这综合反映了一个地区的金融供给等的发达程度。

对于二者在分布上的差异，从图 3（2）可以看得更清楚。该图上、下两部分分别为商业借贷和民间借贷省级利率的密度曲线。商业借贷利率固然较低，分布因此更为左偏，同时，其分布亦更加集中，而民间借贷利率的密度曲线较扁，拖尾亦较长，甚至在 6 分左右出现了第二个峰值。显然，民间私人借贷市场在空间上的分割更为严重，这与私人借贷个体的差异性更大、对外部人意味着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更强的信贷约束等问题是相对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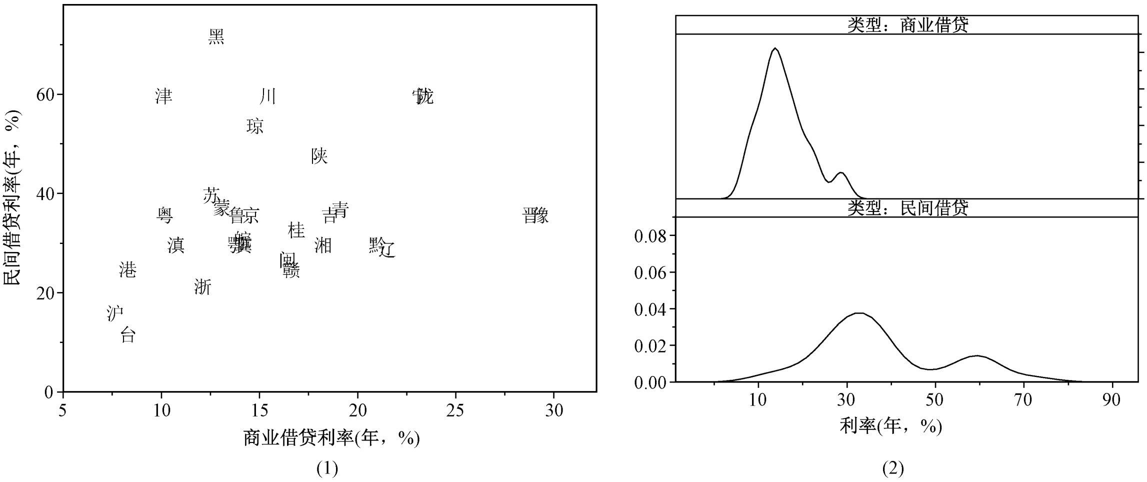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类型利率的省际分布（1911—1936）

说明：1）民间借贷样本为各省商埠以外的县镇、农村地区，私人之间的货币借贷。考虑到资料的复杂性，对该样本取中位数绘示。2）商业借贷利率采用各省商人或传统金融机构借入资金的利率，取平均值绘示。3）右（2）所绘为两类利率省际分布的密度曲线。

如果将数据放到地图上，利率在空间上的分布形态就会更加明了。如图 4 所示，1911—1936 年间民间日常借贷的利率存在比较明显的南北差距，南方普遍低于北方，西北省份的利率又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当然，这其中部分是受资料的影响，如广东、四川、黑龙江等省的数据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左翼的报告，①强调高利贷的严重，由此导致利率相对高估，但总体的形态仍是比较明确的。至于商业借贷利率，考虑到该数据的代表性稍好，故而将 1840 年以前、1840—1911 两个时期一并绘示。仅就 1911—1936 年间而言，沿海地区普遍较低，西部内陆地区则普遍较高。如果看商业利率的长期变化趋势，则沿海、沿江受通商口岸影响较大的地区大致有下降的倾向，而山西、河南、山东等诸华北腹地的利率在 20 世纪以前未必低于东南沿海，后来却趋于上升。

3、其他属性的分布及其与利率的关系

对于民间借贷的理解，不仅需要关注利率，而且也要关注借贷规模、信用方式等其他属性。以往关于“高利贷”的研究会从资本积累等角度出发，利率高当然会使扩大投资难度增加，但也同样可以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流向投资。而之所以这个互动过程会停顿在某个高利率状态上，说明金融市场本身的机制或说制度出现某种阻碍，使更深的金融交易（比如，更多、更大、更熟练的金融机构）难以发生、发展，其表现之一就是信贷约束在低位就发生。在数据库所利用的各类资料中，个案类的资料通常会对借贷交易的各方面属性加以界定，不妨选取此类数据来做初步的统计分析。同时，为了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和异常点的影响，兹选择 1937 年以前、年利率不

① 如《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 年）收录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决议案》、陈翰笙、王寅生《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等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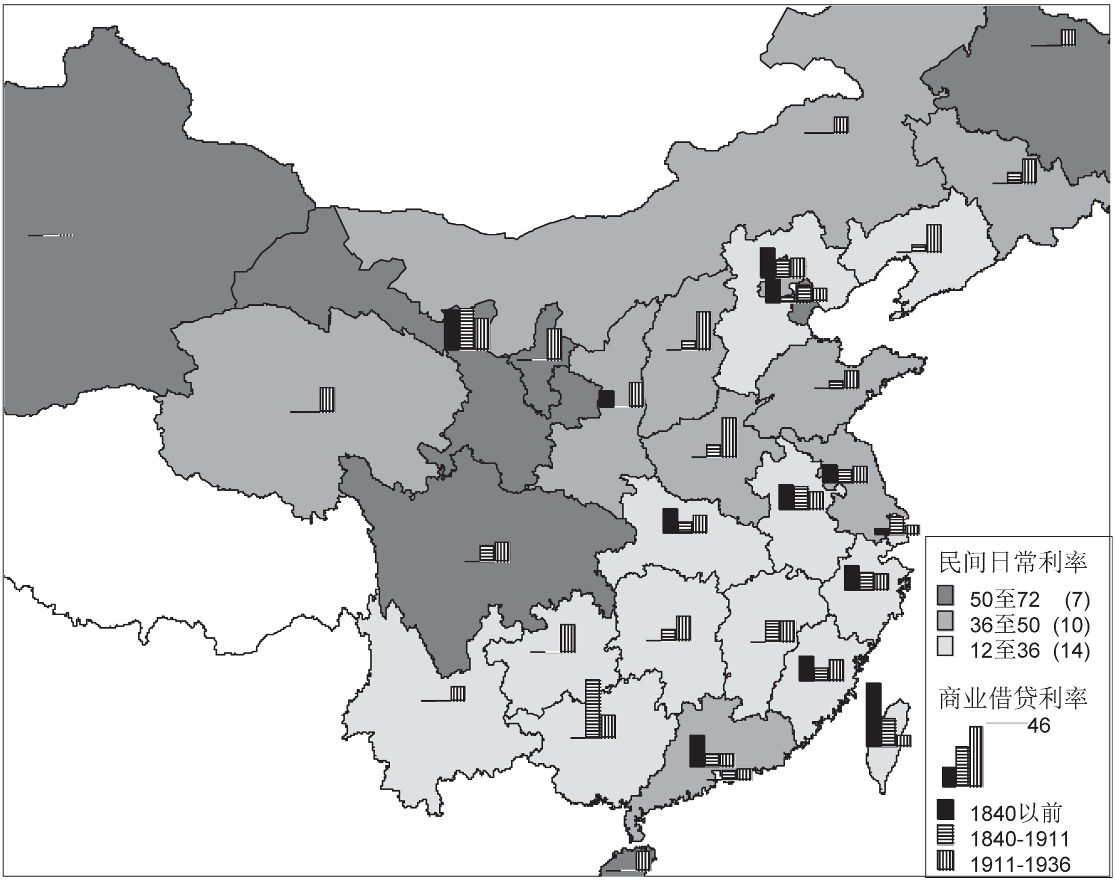

图 4　各省利率的高低及其变化

说明：1）民间日常利率所取样本为各省 1911—1936 年间商埠以外的县镇、农村地区，私人之间货币借贷的利率。考虑到资料的复杂性，对该样本取中位数绘示。2）商业借贷利率采用各省商人或传统金融机构借入资金的利率，分时期取平均值绘示。柱形高度为 0 代表缺数据。3）利率均转换为年利，单位为% 。

超过 500% 的个案类样本，共 5800 笔。

在数据库的子表中记录了各笔借贷的借款额，但这些借款额包括各种货币和实物单位，容易产生折算上的偏差，有的甚至难以折算。因此，在统表中将借款额粗略地划分为四档，至少将规模特别小和特别大的样本与其他样本区别开来。具体是：借款额低于 1 两银、1 银元或 1 串制钱者，定为微小借贷，1 ~ 100 两/元/串为普通规模，100 ~ 500 两/元/串者为较大额，超过 500 两/元/串者为大额。对于信用方式，也划分为若干组别：不存在抵押或担保之信用借贷，以粮食、衣物等动产为抵押者，以典、押等形式将土地作为抵押者，以机器设备或证券等资产为抵押者及明确以他人（包括政府）作保的担保借贷。表 4 报告了借款规模和信用方式不同组别的样本量及这些组别下利率的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

在借贷规模中，1 ~ 100 两/元/串的普通规模者占了绝对多数，大额借贷并不多。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银行、票号等机构的交易主要体现在行市样本里，但另一方面至少说明私人借贷的金额是比较有限的。在 19 世纪之前，绝大多数民间的投资还是来自私人间的借贷，所以，这或许又反映出传统经济里大多数投资的规模也是有限的。同时，1 两/元/串以下狭小的范围内却不成比例地分配着相对较多的小额借贷，显示出民间借贷左偏的倾向。当存在众多规模微小的借贷时，彭凯翔、陈志武、袁为鹏曾通过徽州等地的样本说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利率会随借贷

规模的增加而下降。① 这在表中亦有所体现：无论是以均值还是中位数衡量，借贷金额越大，利率则越低。至于还有数十笔规模未详的借贷，主要是来自刑科题本中的债务命案样本，大多应该也是规模甚微的，且包含较高的借贷风险，利率因此甚高。此外，小额借贷的标准差也最大，因为其中不仅有年利数倍的“高利贷”，也有不少零利率的互助融通。对于后者，如 Brandt and Hosios 所论，利息最终会在未来以其他方式回报，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不付利息。如果考虑这一因素，小额借贷的平均利率还要更高。②

表 4　不同借贷规模与信用方式下的利率（年，%）

	借贷规模					信用方式					
	小额	普通	较大额	大额	未详	信用	动产抵押	土地信贷	资产抵押	担保	未详
均值	47. 50	24. 46	19. 34	16. 48	59. 12	28. 13	25. 41	21. 54	17. 01	22. 02	41. 26
中位数	24. 00	20. 00	16. 95	12. 00	54. 55	20. 00	24. 00	20. 00	12. 00	18. 00	24. 00
标准差	79. 65	27. 41	13. 81	15. 56	28. 20	36. 37	20. 63	12. 47	21. 22	21. 60	67. 85
样本量	424	4286	324	217	50	1 333	110	2 460	261	344	1 292

再看信用方式。在 5800 笔借贷中，土地信贷是最多的，其次是没有明确的抵押或担保，主要基于借款人个人信用的交易。考虑到未详中绝大部分也是不明确抵押或担保的信用借贷，该类数量应该是和土地信贷相当的。③ 在 19 世纪末以后，随着银行等新式金融的兴起，以土地以外的设备、权证等资产作抵押的借贷有了一定的增加——此前在徽州等地亦有以会股、铺产等资产抵押借贷的案例，但占比仍较有限。④ 另外，传统的田宅、钱债立契时多有中人、保人等名目，但其担保义务往往并不明确，这里只将比较明确者归入担保借贷，所以也是在 19 世纪末以后才增多。而动产抵押借贷最少，主要是因为典当业的借贷大体反映在行市里，私人之间则不便事先扣押随时可消费的动产，较多是事后以动产索偿。如果仅就抵押的可靠性而言，土地等长期资产作抵押无疑是最优的，信用贷款则是最不可靠的。所以，20 世纪前期的金融学者常抱怨国内的借贷传统上是对人信用（主要是针对较少土地信贷的城市工商业金融而言），缺乏各种以资产为抵押的金融工具，利率因而较高。从数据来看，信用借款的利率均值的确稍高，动产抵押、担保、土地和资产抵押的利率依次递减，但如果看中位数，则不尽然。信用借贷的方差较大，低利率者并不少，所以中位数和土地信贷竟是一样的，比动产抵押则稍低。其中的原因在于信用借贷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个人信用虽不济，但的确无抵押物，利率自然较高；另一种情形则是个人信用较好的商户等，他们之间的往来借贷多不需抵押，但利率比普通的抵押借款还低。

换言之，对于普通平民，如果缺乏可靠的抵押，要获取贷款是比较困难的，而对于信用较著的殷实商户，信贷所受的约束则较弱。如果比较不同规模的借贷其所采用的信用方式，这一点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如表 5 所示，小额借贷多无明确的抵押（“信用”或“未详”），普通借贷多以土地为抵押，较大额与大额借贷对土地抵押的依赖则大大降低，转为以信用借贷为主。所以，信用方式并不仅仅是与利率对应的一种可选择的交易组合，它本身还是信贷获取约束的体现——抵押对于缺乏个人信用的贫民是必需的，但真正的大额借贷依赖的不是抵押，还是个人的信用。进

① 彭凯翔、陈志武、袁为鹏：《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究》，《经济研究》2008 年第 5 期。

② Brandt and Hosios, “Interest-Free Loans between Villag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10, 58. 2, pp. 345 – 372.

③ 由于典卖契利率整理困难，纳入整理者尚较少，土地信贷的重要性或更高。但与此同时，小额信用借贷多没有书面记录，难以保留下记录，所以其重要性亦有可能低估。无论如何，信用借贷与土地信贷都应是最主要的两种方式。

④ 参见吴秉坤《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资料汇编及研究》所辑徽州借贷资料及笔者在该书序文中所做的统计描述。

而，信用方式并不只是直接地与利率发生关系，也会通过影响借贷规模，间接地作用于利率。因此，借贷规模对利率的影响除了来自与交易成本相关的规模效应外，还有部分当是来自信贷获取约束。

表 5　借贷规模与信用方式间的关系

借贷规模 \ 信用方式	信用	动产抵押	土地信贷	资产抵押	担保	未详	合计
小额	82 （0.190）	4 （0.009）	67 （0.160）	3 （0.007）	1 （0.002）	267 （0.630）	424 （0.073）
普通	926 （0.220）	100 （0.023）	2256 （0.530）	207 （0.048）	262 （0.061）	535 （0.120）	4286 （0.740）
较大额	136 （0.420）	2 （0.006）	98 （0.300）	25 （0.077）	49 （0.150）	14 （0.043）	324 （0.056）
大额	142 （0.650）	3 （0.014）	28 （0.130）	14 （0.065）	25 （0.120）	5 （0.023）	217 （0.037）
未详	47 （0.086）	1 （0.002）	11 （0.020）	12 （0.022）	7 （0.013）	471 （0.860）	549 （0.095）
合计	1333 （0.230）	110 （0.019）	2460 （0.420）	261 （0.045）	344 （0.059）	1292 （0.220）	5800

说明：表中所列为各组信用方式与借贷规模对应的样本数，样本数下括示的是该行借贷规模组别中，各信用方式所占的比例；信用方式合计栏在样本数下括示各借贷规模占总样本的比例；借贷规模合计栏在样本数下括示各信用方式占总样本的比例。

4、清代民间借贷利率变化之一斑

清前中期至 20 世纪前期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国和受“工业革命”洗礼的各经济体发生“大分流”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或不发展一直受到众多研究的关注，利率则是其中重要的解释变量。但是，关于利率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文献中的资料不够系统，讨论也很有限，我们不妨用数据库来做一些尝试。同时，在利率的变化过程中，如在讨论图 4 时提到的，各地的趋势的确可能存在很大差异。这时，构建某些较可靠的区域性序列比勉强估计全国的总体趋势更有意义。

又如前文已述，民间借贷的资料在地域上分布很不平衡，特别是 1840 年以前，尤其集中于徽州。因此，如果要构建跨时期的序列，首先值得考虑的即是徽州样本。另一个可资参照的样本是地域分布较广的刑科题本，它的样本量目前虽然不足以用来构建每个区域的序列，但其构成较为简单——主要是小额的信用借贷，内在的可比性应该还是较强的。不过，如前所述，这些个案样本中的利率可能受具体交易的规模以及信用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简单地进行平均恐存在扭曲。这里采用的方法是，在控制各种因素的条件下将前述徽州样本的利率对年度系数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出其影响系数。具体控制的因素有前述借贷规模①和信用方式，还有借贷使用的货币或实物类型、借贷方身份和月度因子。根据这一估计即可求得给定年度下，以给定条件借入一定款项所承担的利率之期望。

具体地，我们可以求出同样是平民借入 10 银元（比较居中的借贷规模）且同样采取信用借贷方式，其在历年所面对的利率。然而，这样得到的年度序列存在不少缺值，也受某些年份样本过少、一时的风险事件冲击等很多偶然因素干扰，所以又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对该年度序列进行插值处理，并提取出其中趋势性的变化，得到最终的趋势序列。对于刑科题本数据，也类似地先估

① 为得到更准确的估计，回归所用数据为换算成谷物的借款额，而非借贷规模的组别。对于这一换算所用的方法和基本结果，参见彭凯翔、陈志武、袁为鹏：《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究》，《经济研究》2008 年第 5 期。

计其 10 银元借贷的历年利率[①]，但由于其缺值较多，年度间样本的数量和地区分布均差异较大，导致年度序列的变化过于剧烈，所以，采用更粗略但也更稳健的非参数方法直接作平滑，估计出一个大致的趋势。

图 5 绘示了上述估计结果。徽州序列跨越时期较长，覆盖清初直到 20 世纪前期的整个时期，同时在长期内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当然，这一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如图所示，10 银元信用借贷的利率与其乡例接近，大致在年二分多的水平，而其在近三百年里的下降也仅是从 25% 左右降至 20% 余。相比之下，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的欧洲，其公债利率普遍由年 20% 降至 10% 以下，民间资本的利率则有 10% 以上降至 6% 左右，这种同样是数百年的长期变化则要剧烈得多。[②] 不过，这些借贷与私人间的普通借贷并不完全可比，变化的程度容或有差，只能说徽州样本所呈现的下降趋势的确尚不足以给历史观察者以类似的强烈印象，并由此形成某种阶段性的论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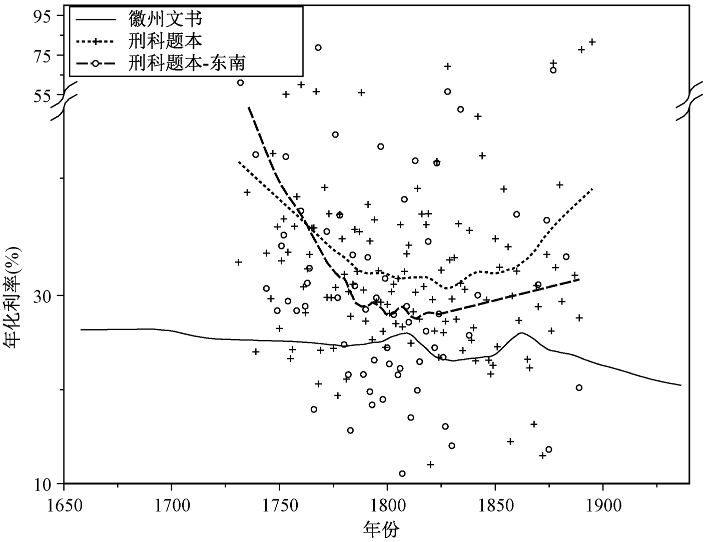

图 5　民间借贷利率的趋势

说明：实线为据徽州样本得到的趋势序列；以“+”表示的是刑科题本中的年度利率估计值，点虚线是对其平滑得到的趋势；以圈点绘示的是刑科题本中苏、浙、皖、闽、赣等东南数省的年度利率估计值，短划虚线是其平滑趋势。关于数据处理的具体说明见正文。

有趣的是，反观刑科题本数据，其跨期的变化形态却迥然不同：18 世纪，利率的趋势线从 4 分多骤然降至 3 分左右，但在 19 世纪又由降转升，后期更攀升至 4 分左右。考虑到不同地域可能变化不同，图中还绘示了东南数省的数据为参照，结果其变化与整个样本非常接近，只是 18 世纪的下降更迅猛——由 5 分左右降至 3 分，19 世纪的上升则相对温和。所以，刑科样本和徽州样本的不同趋势很难说是地区不同带来的。那么，何者更好地反映了民间日常借贷情形的变化呢？应该说徽州样本是更加可靠的。其不仅样本量较大，而且不像刑科样本那样是最终导致命案的选择性样本。果如其然的话，两类样本的趋势之不同很可能与刑科样本的选择性有关。正如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所论，清代司法实践中的高利贷管制有可能加大债务人的“道德风险”，使其在因为高利率发生纠纷时有更强的倾向使用暴力，从而使相关的借贷更有可能出现在命案样本中。[③] 这种倾向同样也会带来“逆选择”，使得高利率的借贷更难成交，或更多地与暴力倾向较低的个体成交，则 18 世纪刑科样本中利率的下降趋势很可能反映了司法管控的加强，而太平天

① 由于刑科题本是跨地区的，因此在回归时相比徽州样本多引入了省级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因素。

② Epstein, *Freedom and Growth: The Rise of States and Markets in Europe*, 1300 – 1750,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③ 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经济研究》2014 年第 9 期。

国后，司法松懈，高利贷更易出现在命案样本中，利率遂又趋于回升。当然，这一解释还只是试探性的，具体检验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无论如何，不同样本间的差异表明，利率不仅反映了市场供求的力量，还体现了司法、国家等其他方面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清代制度与经济间的关系。

五、结语

通过建立一个综合利率史数据库，我们看到了传统借贷市场的多个层次，简单地撷取某些样本或者资料去评判整个借贷市场可能是不可取的，这也恰恰说明了通过数据库使资料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做研究的必要性。在数据库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各种量化历史研究，如将利率数据与 GIS 结合，运用时间序列方法对利率数据进行趋势识别，对利率的时空变化与人口、地方治理、灾害等变量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等等。本文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但已发现各类型利率在时空上的差异。其中，比较明确的有南北方或沿海与内地之间较为可观的利率差，票号、钱庄诸传统金融机构促进了商业借贷利率的收敛，徽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利率在清代有微弱下降等。这些发现的意义及其背后的原因虽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都有助于更准确和深入地理解 18 世纪前后至 20 世纪前期这一重要时期金融部门乃至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同时，正如文中反复强调的，我们也不应忽略利率史料的复杂性。例如，表 3 显示，四种类型的利率其统计特征迥乎不同；又如，刑科样本和徽州样本呈现出很不一样的长期趋势。不过，史料的复杂性也可能包含新的研究契机。对利率数据而言，它的复杂性主要不在于史料有种种隐讳、歧义等问题，以致带来考据上的复杂性，而是借贷交易本身有复杂性，它嵌入在社会关系、法律制度等结构内。换言之，只要我们在整理数据库时尽可能将相关的变量纳入其中，在研究时又保持谨慎，那么，通过利率的量化研究，反映的将不仅仅是借贷市场的情形，还将有助于对清代等历史时期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的理解，从而加深对制度变迁带来的影响的理解。这也是我们建立历史数据库和推动量化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

References

Bank Weekly of Shanghai, ed. *Essays on Shanghai' s Financial Market*. Shanghai: Bank Weekly of Shanghai, 1923.

Caoshu ji, Pan Xinghui and Que Longxing. *Shicang Contracts*. Volume 1.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Centr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Bureau, ed. *Collection of Reports on the State of Agriculture in* 1934. Nanjing: Central Agriculture Research Bureau, 1936.

EconomicResearch Department of Central Bank, ed. *Essentials of China' s Rural Finance*. Shanghai: Commerce Press, 1936.

Feng Hefa. *Materials of China' s Rural Economy*. Shanghai: Liming press, 1933.

Feng Hefa, *Materials of China' s Rural Economy: Continuation*. Shanghai: Liming press, 1935.

FinancialConsolidation Committee of North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ed. *The Report of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Committee of North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Dalian: ? 1931.

FinancialResearch Institute of PBC, 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itibank in China*. Beijing: China finance press, 1990.

FinancialResearch Institute of Shanghai Branch of PBC, 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Jincheng Bank*.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1983.

FinancialResearch Institute of Shanghai Branch of PBC, 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hanghai Commercial and savings Bank*.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1990.

Industrial Department ofHebe Province, e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tatistics of Hebei Province. Tianjin: Hebei

Industrial Department, 1931.

Hong, Jiaguan and Zhang Jifeng.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modern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1989.

Hsiao, Zheng. *Materials about land problem in mainland China in* 1930*s*. Taipei: Chengwen press, 1977.

Huang, Jianhui. *A History of Shanxi exchange banks*. Taiyuan: Shanxi Economic Press, 2002.

Huang, Miantang *Studies of Qing history*. Jinan: Shandong Qilu press, 1990.

Kong, Min. The*Collection of materials about Nankai economic index*. Beijing: China' s social science Press, 1988.

Li, Jinzheng. *Research on the rural credit of modern China*. Beijing: Renmin Press, 2003.

Li, Jinzheng. *Research on the rural social economics of modern China*. Beijing: Renmin Press, 2004.

Li, Wenzhi. *Materials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Beijing: Sanlian Press, 1957.

Li, Yixia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in modern China*: 1897 – 1945. Taipei: Dongda Book Company, 1997.

Liu, Boshan. *Huizhou document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Liu, Qiugen. *A History of pawn institutions i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1995.

Liu, Qiugen *The Usury capital in Ming and Qing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tific literature Press, 2000.

Mi, Gonggan *Essays on the pawning*. Shanghai: Shanghai Book Store, 1992.

Shanghai Branch of PBC, 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Native Banks of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Press, 1960.

Shi, Ruomin and Niu Bailin, eds. *Materials and Researche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counties of Ping*, *Qi and Tai in Shanxi Province of China*. Taiyuan: Shanx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TheStatistical Bureau of the Conptroller Department of the Natioan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d.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6.

TheTemprary Survey Bureau of the Industrial Department of Manchuria, ed.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rural status of China*. Volume 15. Tokyo: Longxi Book Store, 1980.

Wang, Jingyu. *Materials of Modern China' s Industrial history*. Volume 2, Beijing: Zhonghua Press, 1962.

Wang, Yuxin and Zhou Shaoquan. The Huizhou Contract Documents during the past Millennium. Hebei: Huashan wenyi press, 1933.

Wu, Bingkun. The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and Researches of Private Interest Rates in Huizhou from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Xu, Dixin and Wu Chengming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m in China*. Volume 1. Beijing: Renmin press, 1985.

Yan, Zhongping. *A Collection of Statistical Materials of the Modern China' s Economic History*.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55.

Yang, Yinpu. *Yang' s research on China' s finance*. Shanghai: Shanghai Book Store, 1991.

Zhang, Youyi, *Materials of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Beijing: SDX Joint Publihing Company, 1957.

ChenZhiwu, Lin Zhan and Peng Kaixiang, "Violent Conflicts in Private Lending: a Research Based on Qing Dynasty' s Homicide Report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4) 9.

Fang Xing, "Rural usury capital in early Qing",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1994 (3).

Peng Kaixiang, Chen Zhiwu and Yuan Weipeng, "Mechanism of Rural Credit Market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8) 5.

Project team of Shanxi documents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the fourth bulletin", URL: http: //www. npopss – cn. gov. cn/n1/2016/0616/c393013 – 28450708. html, 2016 – 6 – 16.

Wang Liyan, "A Study of Credit from Late Qing to Republican: according to Ten Account Books", Master Thesis, Hebei University, 2013.

Wang Shiqing, "Research on Rural Credit of North Taiwan in mid 19th Century", *Taiwan' s Social Economics in Qing Dynasty*, Taipei: Lianjing press company, 1994.

WangTianjiang, "Rural Usury in Modern Henan", *Modern China history studies*, 1995 (2).

Wen Rui, "Traditional Private Credit and Rural Social Economics", *Modern China history studies*, 2004 (3).

YangGuozhen, et al., "Collection of Contracts in South Fujian". *China' s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1990, Special issue.

YuanWeipeng, Ma Debin, "Commercial Account Books and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focus on the Account Books of Tongtaisheng (1798 – 1850)."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2010) 2.

ZhuYingui, "Introduction and reform: Guanli institution in modern China' s enterprise", *Modern China history studies*, 2001 (4).

Homer, Sidney and Richard Sylla. *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Rosenthal, Jean-Laurent and R. Bin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Fontaine, Laurence. *The moral economy: poverty, credit and trus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Stiglitz, Joseph E., and Andrew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3 (1981): 393 – 410.

Epstein, S. R. *Freedom and Growth: The Rise of States and Markets in Europe*, 1300 – 1750.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Brandt, Loren, and Arthur J. Hosios. "Interest – Free Loans between Villag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8. 2 (2010): 345 – 372.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ese Interest Rates from the Early Qing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atabase of Chinese Interest Rates (1660 – 2000)

CHEN Zhiwu (Yale University; zhiwu.chen@yale.edu)
PENG Kaix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Henan University; kaixiangp@qq.com)
YUAN Weipe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jyuanwp@163.com)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basic expla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data collection, and design of the historical data base of Chinese interest rate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the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indicators, the selection of data, and background and forms of borrowing and lending, interest rates varied greatly, and the article shows these differences explain the comparatively large differences in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interest rates. The article makes clear the origins of a variety of misconceptions in literatures about China' s for interest rate history, and prov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atistical databas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statistics in this data base,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initial examination of interest rates from the early Qing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long term trends in interest rates, and other issues.